

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

收音机在上海

(1923—1949)

姜 红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

# 收音机在上海

(1923—1949)

姜 红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收音机在上海：1923  
~1949 / 姜红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328 - 2

I. ①西… II. ①姜…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1923 ~ 1949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528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傅惟本

**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

——收音机在上海(1923 ~ 1949)

姜 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328 - 2/K · 1977

定价 20.00 元

# 目 录

引言 / 1
一、西物东渐——广播收音机的传入 / 3
二、已有研究成果概述 / 8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 11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 / 13
第一章 上海收音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 21
一、收音机从外洋输入上海的历史 / 21
二、上海华商无线电制造业——从萌芽到成长 / 26
三、上海无线电收音机市场 / 32
1. 外商收音机销售 / 33
2. 华商收音机销售 / 34
3. 营销方法 / 37
四、收音机价格及无线电消费群体 / 40
五、业余无线电运动在上海 / 43
第二章 上海广播电台业发展概述 / 46
一、上海广播电台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 46
1. 第一阶段(1923年—1929年) / 46
2. 第二阶段(1930年—1937年) / 47
3. 第三阶段(1938年—1945年7月) / 51
4. 第四阶段(1945年8月—1949年5月) / 52
二、广播电台类型及示例 / 56
1. 国营电台 / 56
2. 公益电台 / 59

3. 华商商业电台 / 60
4. 外商商业电台 / 61
三、政府的管理与监督 / 67
四、播音员 / 71
第三章 新闻报道与国家民族意识的构建 / 75
一、上海广播电台新闻播报的历史考察 / 75
1. 第一阶段(1927年—1935年) / 75
2. 第二阶段(1936年—1938年) / 76
3. 第三阶段(1941年12月8日—1945年8月) / 77
4. 第四阶段(1945年8月—1949年5月) / 78
二、广播对时政的干预 / 82
1. 上海广播电台抗战时期的播音活动 / 82
2. 战后的时政播音内容 / 84
三、新闻播音用语 / 89
第四章 广播与市民都市生活 / 90
一、娱乐生活 / 90
1. 戏曲、曲艺 / 90
2. 歌唱 / 108
3. 唱片 / 119
4. 话剧 / 121
二、广播与市民宗教信仰生活 / 122
第五章 广播与文化知识普及方式的巨变 / 125
一、南京国民政府播音教育计划及其实施 / 125
二、上海广播电台的文化知识传播 / 128
1. 国语教学 / 129
2. 国学教育 / 130
3. 外语播音教学 / 131
4. 医学卫生知识传播 / 133
5. 科学常识普及 / 135

第六章 播音广告 / 140
一、民营电台播音广告的经营 / 141
二、大工商客户与播音广告 / 144
三、播音广告的效应及其对上海广播事业的 正负面影响 / 147
结语 无线电广播与中国的巨变 / 151
参考书目举要 / 154
后记 / 157

## 引　　言

1840 年西方殖民国家以坚船利炮迫使中央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也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浪潮。通过翻译出版西方法律、政治、财税、科学著作,设立新式学堂、发行报纸、创办传播西学的学术团体,西方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异质文明的输入对中国固有文化形成惊涛裂岸的冲击,催生了改良、维新思潮,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变革。近 30 年来,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涌现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中国与世界”这一重大母题下,西学东渐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百多年中西遇合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史学家对这一研究存在的偏颇渐生不满。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认为,要全面认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仅研究西学东渐是不够的,应尽早启动西物东渐的研究。熊月之近年来提出,西方器物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中一些西物传入中国,同样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巨变,应积极开展西方物质文化——即洋货输入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他认为与传播西学的报纸、书籍及新式学堂相比,商品的受众面要大得多,不是每一个平民百姓都有能力阅读报纸、书籍,进洋学堂受西学教育,但大多数国民都有机会直接或间接接触感受西方的物质文明或商品,如煤油、煤气、电灯、电话、无线电、照相机、唱机,这是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一种更

加泛化的影响,值得充分重视。

以石印机为例,石印技术的输入使得印刷更加便捷,效率极大提高,对近代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近代变革受惠最大的是石印机,正是这一新的印刷技术孕育了中国的近代化。照相机实现了稍纵即逝的图像定格,时间得以凝固,瞬息成了永恒。像片还使图像的传播成为可能。空间和距离因有了电话不再成为人们交往的阻碍,人类的活动范围由此得以扩展。上海未建发电厂之前,煤油一直是家庭用以照明的燃料,直到20世纪50年代,家庭使用煤油仍然十分普遍。煤气的使用同样无处不在,电厂出现前,上海外滩的路灯使用的就是煤气,从此上海的夜不再黑暗。唱机和唱片传入后,成为中国富裕阶层的享受。家庭聚会,打开唱机,放上西乐或中国戏曲唱片,美妙声音袅袅传出。唱片和唱机的发明还使艺术的保存和复制成为现实。自行车使国人能借助机械装置超越自身的局限,用更少的时间去更远的地方,办更多的事。

作为西物中的一种,无线电收音机的输入为我们研究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巨大变革之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收音机以及广播电台导致近代中国的传播方式发生巨变,从多方面影响了历史进程。收音机和广播电台是国家进行民族动员、强化国民国家认同的工具之一。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每年活动的纪念日都到电台发表讲话,进行动员。在教育落后的中国,收音机广播的功能得到充分重视,既有一般性的知识教育,也有国学英语广播教育。

其次,收音机播送的唱片、戏剧、广播剧、故事等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人们不出家门,坐在家里就能享受到剧场看戏,

到音乐厅听音乐同样的快乐。收音机也是商家进行商品推销的最好工具,它可以出现在装有广播喇叭的轮船、火车,也可以出现在公园、商场,大量商品广告通过播音广泛传播。

总之,西物东渐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作为一种传自西方的物质文明,收音机、无线电广播与近代中国巨变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作为民营广播电台最多、民众拥有收音机最多的城市,上海无疑是这一课题最好的切入口。

## 一、西物东渐——广播收音机的传入

无线电广播是 20 世纪的伟大科学发明,它的诞生极大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

无线电广播虽然至 1916 年前后才成为真正成熟的新传播工具,但其发明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电报从有线到无线,广播从有线到无线,以及电话的出现,是无线电广播中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早在 16 世纪,西方就有人提出了“感应电报”的设想,18 世纪,欧洲科学家能够通过人工产生大量静电电荷。英格兰的沃森、美国的富兰克率先用金属线输送电流。1844 年美国人莫尔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有线电报在两地之间的发送和接收。1844 年莫尔斯用美国政府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发出了人类第一份电报:“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

电报发明的意义引起人们的高度评价,如有评论称,“电报把传播(信息、思想)与运输(人员、物资)区分开来”。电报的重大价值“不是物资的改变和转移,而是思想的交流”。

电报的发明被迅速用来传播新闻讯息，极大改变了新闻业。如电报发明以前，报纸通常为周刊或半月刊，信息主要来源于邮件和传闻。当时从英国到美国的“新闻”需要4—8周。电报传播的“瞬息性”使人们能在最短时间获得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信息，时效大大提高。新闻报纸成了电报公司最重要的投资人或客户。如《纽约先驱报》1848年开始使用电报新闻，第一个星期就为电报新闻稿支付了12 831美元。可以说，电报的发明促进了现代报业业的成熟。

继有线电报之后，电话机的发明，实现了人类的另一梦想，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首次展出了他的电话机，贝尔在介绍他的发明时写道：这是“通过电子手段传递有声语言和其他声音的一种方法和工具”。

1893年，匈牙利人西奥多·普斯卡在布达佩斯连接多条电话线进行新闻传播，并称之为“电话报纸”。这被认为是“广播的先声”。欧美等发达国家很长时间一直利用电话线网络发展有线广播网。

但有线广播也有一个传播上的遗憾，即没有导线就不能传递信息。1895年因一项新的发明这一遗憾不复存在。1895年9月意大利年仅21岁的发明家马可尼试验成功无线电报传递信号。而早在1864年，苏格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用电磁方程完备地定量表明了“磁场”的思想。1873年，麦克斯韦尔发表《电子与磁学论》论证了电磁过程在空间是以一定的速度（光速）传播的。麦克斯韦尔被誉为“无线电之父”。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法因兰希·赫兹发表电磁波发送与接收的实验论文，无线电波也称为“赫兹波”。

与前人相比,马可尼有意识把无线电实验目标明确在远距离通讯上,经过多年的实验,马可尼于 1895 年取得了实验的成功。1897 年马可尼的信号传送距离达 12 英里,1898 年又提高到 18 英里。1899 年马可尼拍发了从英国到法国的无线电报。1901 年 12 月 12 日,他首先实验横越大西洋无线电通讯获得成功。1903 年他建立了 48 座海洋电台,使无线电通讯运用于航海。

无线电报发明后,得到了广泛运用。1906 年,无线电话的实验又取得成功,能够传递和接收人声。至此广播的技术基本具备。这一年 12 月 25 日晚,美国人费森登在他马萨诸塞州海岸的实验电台里以高频发生器连续无衰减发射技术(即调幅方式)朗读了《圣经》段落,还播放了亨德尔的音乐作品《舒缓曲》的唱片。这是人类首次成功进行的语言和音乐的无线传递与接收的实验。有人将这一天称作无线电广播的诞生日。1907 年费森登又把无线电广播发送的距离延伸到 320 公里。

另一位美国发明家李·德·福雷斯特于 1906 年发明了真空三极管,实现了无线电技术的重大突破。

1910 年,福雷斯特与费森登合作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成功转播了由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恩里利·科鲁索(E. Karus)演唱的歌剧。

1916 年,福雷斯特在纽约高桥建立了一个广播电台,呼号 2ZK,播送《纽约美国人报》提供的简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广播。

1920 年 3 月 1 日美国政府正式批准广播设施可以私营,匹兹堡的一家电台首先向商业部申请执照,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注册的广播电台,批准号为 KDKA。

无线电自 20 世纪初问世后，便在欧美各国迅速流传。自美国出现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广播电台之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试验性电台。1920 年荷兰的广播开始试播音乐。英国、西班牙也开始了试验性广播。1922 年，苏、法、英、罗马尼亚、巴西、瑞士、智利、古巴设立广播电台。1923 年，中、德、加拿大、荷兰、比利时、菲律宾、澳大利亚、芬兰、捷克、南非播音。1924 年，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奥地利播音。1925 年，日本、印尼、锡兰、阿尔及利亚、挪威、丹麦、瑞典、匈牙利、秘鲁、新西兰播音。中国出现广播电台仅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两年。<sup>①</sup>

上海是无线电广播最早输入的中国城市之一。自 1923 年奥斯蓬电台开播至 1937 年，十四年间，上海的广播电台最多时达四五十家，占同时期全国电台总数的一半。1938 年至 1945 年间，上海的广播事业受到敌寇的摧残和严厉钳制，1946 年至 1949 年，上海的广播电台数量又呈爆炸式增长，一度接近八十家。

和摄影以图像、报纸以文字传播讯息不同，播音传递的是声音，如前所述，19 世纪有线电话的发明就实现了声音的异地传送，但声音的无线传播比有线传播显然更加自由方便，只要有一台收音机，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收听到广播电台播报的节目。声音的无线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场革命，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影响难以估量。

广播电台使新闻讯息在同一时间得以传递至整个国家，这对于社会形成共识、国家进行现代化动员以及国家的统一所具有的

---

<sup>①</sup> 李幸、刘荃：《传播媒介的历史之光：广播电影电视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影响是其他任何传播工具都无法比拟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决定设立中央广播电台，1932年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中央电台开播后，十分重视新闻报道，每晚八点至九点向全国播送重要新闻。并要求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电台在同一时间转播。中央台还经常播送政府要员的广播讲话，上海的电台也有选择地予以转播。除转播中央台外，上海的国立电台对新闻播报也十分重视，每日用国语、英语多次播报本市的重要新闻。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交通部电台与《大晚报》合作，在该台设立分台，一有重要新闻就及时播报。国民政府要员对广播的动员功能也较重视，蒋介石多次到电台宣讲新生活运动的宗旨。1946年蒋经国来沪“打老虎”，曾利用电台作“河东狮吼”，警告奸商，坦白交代，向市民表达清肃腐败分子的决心。

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是广播的另一重要功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人士，对此有高度共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播音教育机构，制定长期推广实施计划，还购买了一批收音机，分发各地民众教育馆及学校，要求组织民众和在校学生按时收听中央电台每日播出的教育类节目。同时，上海的教育部门也利用本地的教育资源，有计划请专家到公营电台播讲各类知识。上海的民营电台虽然未能大规模播出教育节目，但仍尽其所能播出一些知识类节目，如播送外语教育节目，教授的语言有英语、法语、俄语等，还有医学知识、科学常识、法律知识等。学术讲座的内容更是无所不包，涉及甚广。

上海的广播电台因经济的压力，播放娱乐节目的时间较长，一定程度遏制了播音在新闻传播、文化知识普及等方面的作用，但娱乐节目的大量播出，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20世纪上半叶

的上海，都市娱乐业高度繁荣，戏馆林立，笙歌彻夜，但进剧场看戏聆曲的花费仍远远高出收听广播节目的支出。至 1937 年，一台国产五灯收音机的价格约 50—70 元，一般职员阶层尚能承受，听广播找乐子成为市民的主要休闲方式。根据上海五方杂处的特点，电台所播戏曲南腔北调，能满足不同方言群体的需要，如北方的平剧、蹦蹦戏、评剧、大鼓，南方的申曲、沪剧、绍兴大戏、越剧、苏滩、评弹、四明文戏、宣卷、粤剧、粤曲、川剧、淮扬戏等。

歌唱是电台播出的另一深受欢迎的娱乐节目，明月歌曲团、妙音团、玫瑰团、梅花团、爵士社等几十个歌唱团体常年在各大电台演唱中外歌曲，吸引了无数年轻听众，捧红了不少歌手，广播电台成了流行音乐的推手。

无线电广播无远弗届、不受听众文化程度限制的特点，使之成为商家促销的“无上利器”，许多商家趋之若鹜，纷纷斥资投放播音广告，一定程度促进了商品销售，也间接刺激了电台播音业的繁荣。

总之，无线电广播的输入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是导致近代上海社会发生巨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深入研究。

## 二、已有研究成果概述

收音机传入中国后，便引起人们的好奇，相关的记载和报道连篇累牍。1931 年王崇植、恽震合著的《无线电与中国》，系统介绍了无线电传入中国的史实。文中涉及收音机在上海的情况，保存了收音机传入上海的早期资料。胡道静 1937 年 3 月 8 日在上

海市播讲的《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虽是一篇播音稿,但对上海早期广播史作了清晰梳理,是有关这一课题最有价值的文献。

1986 年中国台湾学者温世光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对 1922 年至 1949 年中国广播史作了系统论述,对公营电台的历史尤为关注,弥补了大陆同类著作的不足。

1987 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播大学)的赵玉明教授,出版了《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以较多篇幅对上海广播史作了初步梳理,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如上海广播史的开启时间,收音机传入上海初期的状况,还尽其所能对广播的功能,如娱乐、商业广告作了论述,对国民政府在推动广播事业的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有所涉及。但诚如赵玉明所说,上海广播史的内容极其丰富,绝非一本教科书可以写透。赵先生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框架,作者着重梳理历史史实,勾勒历史发展脉络,深度有所不足。当然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我国广播史的专著,这部著作仍然值得尊重。

赵先生的著作出版不久,陈尔泰就东北广播史发表了不少论著,在资料上有所发现。陈尔泰另一部作品《中国广播史发轫史稿》对广播技术的发展有系统的梳理,提出了广播史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广播史也吸引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眼光。2011 年出版的《战争的回忆》由贵志俊彦、川岛真、孙安石主编,汇集了由 20 多位日本青年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广播史的文章,着重梳理日本与中国广播史的关系,介绍了不少敌伪时期,日本在华广播活动的史实。

除了专著,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1 年,国内各大高校的学报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近代科技史学

者的论文。如宋轶文、姚远等人发表的《晚清无线电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无线电月报〉开无线电专业期刊先河》，梳理了早期无线电知识的传播史实。姚璐的《〈无线电台年刊〉与无线电广播装备技术的传播》初步梳理了近代中国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轨迹，阿伦娜的《电化教育的孕育与诞生》对播音与文化教育的普及历史作了较深入讨论。肖燕雄的《1949 年前我国广播法规的“平衡”理念分析》（《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10 卷第 5 期，2010 年 5 月）对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播法规作了探讨。

上述论著虽不同程度涉及上海广播史，但都不是独立的广播发展史。历史上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广播电台之多在世界大都市中首屈一指，全盛时期，从凌晨 6 点到深夜 2 点，每个波段连续不断播送十余小时，内容与市民的生活密切联系，非常值得研究。2007 年华东师大博士研究生汪英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文约 20 万字，研究时间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37 年。作者查阅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实证上达到一定水准。理论上，全文在广播与社会互动的框架下，对广播的多方面影响作了探讨。如广播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广播对商业销售的促进（播音广告），广播与市民休闲娱乐的关系，广播在国家民族动员方面的作用等等，都有所涉及。这是多年来第一部上海广播史专著。

但全文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仍将广播史限制在传媒史的范围，没有吸纳西方关于物质文化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收音机首先是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它的流通就受到生产和销售的影响。例如作为一种商品，收音机的价格如果过

高,只能被少数人享用,它的传播作用必然被大大限制。其次,其智能状态必然受科技进步的影响,收音机以及播音设备的任何一点技术进步都将促进它的传播功能。例如,上海的广播台很长时间不能做剧场转播,因而只能以播放唱片及电台播音为主,这一技术的突破,使得现场转播成为可能,广播转播内容得到丰富,广大听众更加趋之若鹜。总之揭示无线电收音机的物质、商品属性,清晰勾勒广播史与收音机销售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可对上海广播史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

第二个缺陷是,全文只写到1937年,实际上只写了半部上海广播史。毫无疑问,30年代是上海广播史不可忽视的岁月,但战时及战后的上海广播史同样十分丰富。由于作者把论述的下限定在1937年,上海广播史的不少重要内容未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

###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物质文化在西方有很长的研究历史,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器物研究为主体,举凡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使用过的器物,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城市的公共浴室、下水道、厕所、交通工具(轮船、人力车、自行车等)都被逐个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成果。西方学者不仅研究商品的流通或交换,更加关注商品售出进入社会后被使用的历史,即商品的社会化过程,商品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怎样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概而言之,西方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及商品的社会史。在这一理论框架内,西方学者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又提出了物的社会生命的概念。他把商品看作一个生命